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五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九期 ——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502c）

---

【往事如烟】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文革中一页：1967年二月五日纪事	陈益南
【文艺评论】评喻智官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	傅正明
【当事者说】从12军军管安徽的经历看文革大动乱	李德生
【各抒己见】毛泽东为什么不准周恩来做手术？	洗 岩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往事如烟】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文革中一页：1967年二月五日纪事

• 陈益南 •

记录者：听说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将湖南的一个大造反派组织也打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真有这么回事吗？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到处在鼓噪号召老百姓“造反”吗？他们为何又会将造反派视为“反动分子”的？

当事人：确有这回事，我还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震动。不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似乎有些“反常”的事，至今我也不清楚其原故。也许，高层的文革与社会底层的文革，终究不是一码事，而只是在某些方面的表层看似合一而已吧。十年文革中，其实是发生了很多事，而不仅仅是用“动乱”一词，就可以说明白的。

（一）背景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的权》公开号召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的浪潮又掀起了一个高峰。但此时，湖南省长沙市的造反派在成功地打垮“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纯官办的保守组织之后，却面临着一场内讧。胜利了的造反派逐渐分为两个阵营：以“湘江风雷”为首的一派和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高司”为首的一派。

“高司”是当时长沙市全部八所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的组织，有两万多名大学生。在著名的长沙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中充当了造反先锋的湖南大学红卫兵，便是它的一支劲旅。这些大学生红卫兵是最先点起湖南省的造反烈火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也是他们鼓动、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们能说会道，尤其擅长宣传，只要他们愿意，一夜之间，整个长沙市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可以全部是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标语，在与“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派红卫兵的宣传战争中，他们是举足轻重的力量。按照造反的观点看，这个“高司”确实是湖南省造反派的功臣和先驱。因而，“高司”的头头们当时便很有了一份做湖南省造反派首领的架势。

“湘江风雷”的正式名称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虽说其有“红卫兵”三个字，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学生组织，而是一个以工人为主体、更有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教师、学生、街道居民、下乡回城知识青年等）参加的混合性群众团体，它与“东方红总部”等工人造反组织一样，其头头也大多是工人或工厂的干部。在“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头头的心目中，当然也是承认大学生红卫兵的功劳的，但若讲到担任领袖，他们则搬出了毛泽东主席的语录：“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再加上：“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所以，他们从理论与实践，都并不承认“高司”的首领地位。相反，已经羽翼丰满、人多势众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已在发挥自己“天然的”领导阶级作用了。

这大概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后，湖南省长沙市造反派发生内讧，分化为新的两派的重要因素。而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的介入，更加速了这种分化。

中共中央于一月中旬下指示，让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省军区对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袖手旁观的，尽管他们很有些同情保守派。在中央允许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并命令军队去“支持左派群众”时，判断谁是“左派”、并支持谁的权力，就留在了军队自己手里。经过周密的侦察，省军区司令龙书金将军选择了支持“高司”为首的一派，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左派”。理由大概是发现“高司”全是纯洁的大学生，赤诚单纯，而“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组织人员复杂，“造反动机”复杂。

围绕着怎样批判省委第一书记的方法和策略，曾经是在一个战壕并肩战斗的“高司”与“湘江风雷”，终于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白热化了。新的两派都宣称要打倒省委第一书记，而又攻击对方是“保”省委第一书记。结果，省委第一书记就有了挨不完的批斗。一月中旬，刚刚将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击垮，一月下旬，新的派别斗争就开演了，并且愈演愈烈，从标语大战，大字报大战，宣传大战，一直发展到新的拳脚石块交加的武斗再次发生。

支持“高司”的省军区，先是成功地利用了一次“湘江风雷”派方面的一个复员军人造反组织“红旗军”与“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冲击省军区机关大院的事件，竟然使四大首脑机关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于一月二十日凌晨下达了一个“一·二〇”指示，即“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一月二十日当天，湖南“红旗军”的几名头头即被军区抓捕，但是，对整个“红旗军”组织则尚未采取行动。一方面，这个来头很大的“一·二〇”指示，不仅受到了“湘江风雷”派方面所有造反组织的公开抵触，没有一个组织表示拥护，而倒是很多“红旗军决不是反动组织！”“红旗军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组织！”等标语，迅速上了街；并且，更质疑该指示的真伪，要求省军区出示指示原件，同时也向北京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询问以求证实。

另一方面，省军区在抓捕了几名“红旗军”头头后，对这个明令指示说的“反动组织”，也没再采取什么行动；对各造反组织公开抵制甚至对抗中央“一·二〇”指示的言行，也未作任何追究。抵制甚至对抗中央指示的行为，竟然没有受到省军区甚至中央的任何指责，这在当时是极反常的。进而引起了造反派组织对这个指示的怀疑。后来，果然这个指示，被证明是一个“悬案”。

然而，此段时间，省军区并不是没有作为，相反，更大的计划在悄悄进行。终于，利用发现“湘江风雷”组织拥有枪支（其实是省展览馆的展出旧武器，由展览馆的“湘江风雷”支队保管）、“湘江风雷”派人员在武斗中殴打了大学生红卫兵等证据，迅速向中央汇报，并胜利地赢得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具体的批示，在这个有名的“二·四批示”中，显著明确地使用了“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这个名词，并命令省军区对其“采取专政措施。”

## （二）我的二月五日

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批示是二月四日下达的，当天拥有百万之众的“湘江风雷”组织却还蒙在鼓里，准备组织对“高司”发动更大的进攻。而省军区司令龙书金将军则亦不动声色，让二月四日的大白天，仍在“湘江风雷”这一派的欢呼声中平静度过。

二月四日晚十点，我与我们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小李，在支队办公室誊抄完一批大字报后，感到有点儿饿了，便决定上街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到街上遛达遛达。虽然已近午夜，长沙市的五一大街等处仍热闹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涌腾，或围观趁夜刷出的新标语、大字报，或挤围在“湘江风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传车旁，对慷慨激昂的宣传车广播，或以鼓掌欢呼表示赞同，或以嘘声甚至掷石块砸宣传车表示反对。

由于驻长沙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北京红卫兵是支持“湘江风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属于“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因而，在大街上的实力较量，“高司”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劣势。他们新贴上的标语大字报，很快被人撕掉或复盖，声音宏亮的宣传车喇叭，不时遭到石块的掷击，有时周围群众起哄的嘘叫声还会压过宣传车的广播声。

此时的大学生红卫兵的状况，竟似乎又跌回到五个月前的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时那种景象。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围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围攻他们的工人，是市委调来的“赤卫队”，而此刻围攻他们的却是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了他们的工人，也是他们曾千方百计呼吁为其平反，唤醒他们帮助他们举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每每目睹和回想这种情景，便令人有一种历史的悲哀感。

在围观中，在欢呼中或唏嘘声中，不知不觉，临近午夜十二点。我与小李觉得疲倦了，便从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们“红色支队”队部办公室去睡觉，那儿有三张床，供我们休息之用。突然，一辆从湘江西岸驶过来、在车头上挂着“高司宣传车”牌牌的宣传车，沿着五一大街，在缓行中以异常宏亮的声音广播着一条令人惊骇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来电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

其受蒙蔽的群众。全军文革办转，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大街上的人们，全被这条消息镇住了。一时，没有了鼓掌欢呼、也没有了唏嘘喊叫，大家全静静地在听这辆宣传车不停在重复广播这“最新消息。”我站在马路上，象被钉住了，惊愕得好半天还回不过神来。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满脸困惑，神色紧张在问。

“不可能吧？”我也不知该怎么判断这事。

大街上“高司”的宣传车随即用洋洋得意的标准普通话，大声地反复播送这条消息。几分钟后，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发出喊叫声：“‘高司’在造谣！”“‘高司’胡说八道！”随即这些喊叫声迅速扩展为雷鸣般的呼喊：

“‘高司’造谣！”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谣，罪该万死！”

“打倒‘高司’一小撮坏蛋！”

“打！打！！打！！！……”

那辆最先广播“最新消息”的宣传车，一下子被愤怒的“湘江风雷”派群众围住，咒骂声，石块声直冲宣传车，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车，扯断了喇叭电线，使宣传车广播顿刻哑了。我很高兴，心想，说不定真是“高司”造谣，不然，早上七点就来了批示，怎么一整天还没有见什么意外变化。

“过去看看！”我朝小李说。

在我们正准备跑过去看那被愤怒的人们猛砸的宣传车时，一辆辆解放牌绿色军用卡车却突然驶来，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处停下。随即，从车上跳下一批批红领章红五星的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五六式步枪的刺刀一律打开，寒光闪闪。象一股强大的寒潮，顿时将五一大街的热闹气氛冻住。大街上的人，都惊骇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停止了一切行动，停止了一切声音。我又一次惊骇得立住了僵硬了的腿。

大街上仿佛只剩下士兵们列队荷枪跑步“蹬蹬蹬”的声音，打开刺刀和枪栓的“哗哗”响声，以及军官们下命令的威严叫唤声。

“真的抓人了！”好一会人群中终于才有人敢低声说话了。

这低低的话音，亦如一股寒流，刹时将周围人们的心灵迅速冰冻。荷枪实弹的士兵并不理大街上的人群，只是显然有计划地朝各自的目标奔去。五一大街两侧凡驻有“湘江风雷”组织分部、战团、支队等基层组织的招待所、机关、饭店，统统被士兵包围，然后，冲了进去。大街侧有几条通往“湘江风雷”总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士兵们封锁，不准任何人再进。五一大街临街有一座旧教堂，现已是由“湘江风雷”派的一个青年组织驻住，威风凛凛的士兵们很快将旧教堂包围，在大街对面，甚至布有几挺轻机枪，对准教堂的大门。一会儿，冲入教堂的士兵，将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来，在枪刺如林的教堂大门前，把这些青年人推上了一辆早已等候的囚车。

一个年龄比我大佩着“湘江风雷”袖章的工人，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着眼

前这不可思议一幕的我，从麻木中唤醒。“快到那里去！”他轻声对我说，同时嘴角朝大街边一座公共厕所翘了一下，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与小李随他一道迅速跑进了厕所。厕所里，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并不讲话，有的人则只自个低声地咒骂着，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将自己臂上佩的“湘江风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风雷”布符号迅速取下，塞进自己口袋里，有的则干脆将袖章、符号统统扔进了厕坑里。

“丢不丢？”小李拿着已取下的袖章问我。

我有些舍不得，同时也觉得将袖章丢入厕坑太损我们的形象。

“藏好！”我对小李说。

我们将袖章塞进里衣的口袋，然后装着若无其事似的走出厕所。

突然涌来的数辆“高司”的宣传车，欢快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那辆被围观群众扯断电线的宣传车，喇叭也恢复了宏亮的声音。此刻，回荡在大街夜空下的声音，只剩下了一种音符：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批示！”

“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

“绞死叶冬初！”（湘江风雷一号头头）

“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

“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

几辆“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被解放军士兵扣押，临时改作了囚车。属于“湘江风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则都停车熄火，一声不吭地停在马路边，车上的宣传人员围站在车头前，闷声不响地看着“高司”宣传车劲头十足在大街上抖尽威风。

一个个“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被捣毁，一批批“湘江风雷”的人员被拘押，推上不断增加数量的临时囚车。看着这一切，我异常的痛苦，也非常紧张，更有一些害怕。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面对的都是象自己一样的普通群众，或学生，或工人，或干部，却从来还没有面对过解放军，而且是这样杀气腾腾荷枪实弹的士兵。此刻，这一切都如从天降，不仅出现了军队，而且枪口、刀尖都是对准了我们“湘江风雷”，甚至是由我们无比崇敬的中央文革小组下的命令！我的脑子显然一下子容纳不下这一连串突然出现的问题，于是乎，我只感到晕沉沉，昏乎乎的。

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中，也出现了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重复着“高司”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并向“高司”的宣传车和跑步而过的解放军士兵，均报以热烈的如雷震天的掌声。这些群众，除了少数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数则是原已瓦解不复存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湘江风雷”一下子变成了反动组织，他们顿时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二十多天前，当“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借着《红旗》杂志那篇评论之势，踏平他们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之时，他们只有愤恨，却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们竟突然间找到了这样一个发泄愤恨的机会，如何能不兴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号中，他们自发地加二条：“坚决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决定丢弃暗藏的“湘江风雷”袖章。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大街上已有士兵在开始盘查普通的群众。但是，我现在还不是躲的时候，我试图通过一条只能并肩走俩个人的狭窄巷子，插到我们支队部办公室看一下，因我们支队部是在一个商店楼上，外面没有明显标志，而唯一一面悬挂在窗口的显示“湘江风雷”组织的红旗，在傍晚已被收了进屋。因而，我想，现在大概军队还不会发现它，趁天亮前，我们可以将那儿的扩音广播设备和一些物资转走。我和小李悄悄乘人们不注意时，将袖章塞进了大街边的一个邮筒里，然后，如释负重地走开。

小李建议先去大街附近的“胜利”摄影社打个电话，探一探支队部的情况，以防万一。我觉得考虑有道理，于是俩人就先到了“胜利”摄影社。熟门熟人，瞿凯旋开门，亲热地迎接了我们。虽然瞿凯旋他们没有参加“湘江风雷”，而是属于“东方红总部”组织辖下的摄影专业造反兵团，但由于我是公司系统最早参加造反的负责人之一，又是红色支队的头头，特别，我还曾是“胜利”摄影社的职工，因此，我每次去“胜利”都会受到他们热情友好地欢迎。

象瞿凯旋这样睡在店里的人不多，大家都没有睡，正坐在宿舍里议论今夜的事变。我的到来，使他们更没有了睡意。我到办公室拿起了电话筒，一听，奇怪，没有一点声音，我对瞿凯旋说，是不是这电话坏了？

“那不可能吧”。瞿凯旋说着拿过话筒听了听，也一脸困惑。

我们又到营业厅那个电话机旁，拿起话筒，一听，又是寂然无声，我使劲用手拍打话机，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想，怎么这么巧，电话都坏了？架着一副黑宽边眼镜的庞达明走过来，拿起话筒听了听，便断然地说：“不是电话机坏了，而是电话被切断了！”庞达明是“胜利”摄影社的一名摄影师，比我大七、八岁，现在他是“东方红总部”摄影造反兵团的一个头头。他的话一下子使我顿悟。既然今夜军区要采取这样大的一个行动，他们还会让“湘江风雷”的人使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以通风报信而逃跑吗？显然，电信局接到了军区的命令，截断了市内全部电话。我无可奈何，丢下了黑色的电话筒。当我决定仍冒险去支队部察看一下时，庞达明、瞿凯旋他们坚决劝阻了我。认为这个险没有必要去冒，不如在这里休息，待天亮后再见机行事。

这样，我就于“胜利”摄影社摄影大厅内舒适的沙发上，躺着度过了二月四日夜里（实际是二月五日凌晨）的最后几个小时。从而躲过了个人的一次灾难。因为，凡是当天夜里在“湘江风雷”组织所在地方被军队捕捉的“湘江风雷”人员，一律被投入了监牢或临时拘留所。

第二天，恐怖依然笼罩在“湘江风雷”组织人员的头上。大街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地穿来穿去，进一步地查抄“湘江风雷”组织。高大一点的建筑物顶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如临大敌般的武装士兵。街、巷中的封锁虽已解除，但捕人的汽车停在马路边，仍到处可见，不时还可见到一队士兵押着一、二个已被五花大绑的显然是“湘江风雷”头目的人，走向那囚车。

大街小巷的标语，几乎已全部更换成“高司”派的了。在“坚决拥护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的标语上，“湘江风雷”字上已被划了几个大红“×”，以示判其死刑。“高司”一派的宣传车继续兴高采烈地欢叫着，庆祝他们的胜利。“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自然已不复存在，就连“湘江风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亦不见影子。

除了公开的“湘江风雷”总部及几大分部、战团的地点外，对于各单位的“湘江风雷”组织，军队似乎并不太清楚，连“高司”的大学生也不清楚。但，各单位却曾有过“红色政权保卫军”或“工人赤卫队”组织，这些垮了台的保守组织人员，眼见向包括“湘江风雷”在内的造反派报仇雪恨时机来临，于是，不用号召，不用鼓动，他们都自动积极地去为军队的士兵充当耳目，反映情况，甚至带领士兵们到本单位一一点“湘江风雷”人员。这一来，很多“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负责人都这样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组织的人，也被原保守组织人员领士兵抓了来，因为他们被说成是“湘江风雷的外围”。幸亏，负责收容的军队指挥官严格执行只抓湘江风雷头目的命令，才当即被甄别释放。军队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过了昨夜突然行动的数量，以至长沙市各类监狱都再关不下人，只好将两座电影院征用，临时改作监牢。后来的资料表明，那一天，省军区已在湖南省全省同时行动，共抓了上万人。

我与小李一早便离开了“胜利”摄影社。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多少是个支队负责人，应该到支队部去看看，与钟队长他们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办。虽然一路上还见军队在抓人，但我仍抱着侥幸心理。一则，中央文革批示说是对“湘江风雷反动头目”采取专政措施，我们几个虽也算小头目，但自信不属“反动”之列；第二，马上逃跑一法，似是不能采用的，否则，当了个逃兵，今后你还有什么可以号召人的形象资格呢！

一进支队办公室，时年24岁的支队长钟有新，及其他几个支队委员都已在了。一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互相问安，并告诉各自昨夜的惊心动魄经历。支队办公室依然如旧，并没有人动过的痕迹，显然军队士兵还没有光顾过这里，大家不由很有些庆幸。对于中央文革的批示，我们很是愤愤不平，认为一定是省军区汇报了假情况，才导致这个结果。同时也抱怨“湘江风雷”总部的头头们，为何没有积极向中央文革反映，使中央对我们有客观了解。

钟有新说：“事已如此，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赶快想办法，看我们怎么办？”

组织委员老易建议，我们赶快发声明，退出“湘江风雷”。

钟有新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同意老易的建议，同时提议，声明退出“湘江风雷”后，再成建制地将我们红色支队去参加“东方红总部”。“东方红总部”是我们一派的，中央文革批示没有牵涉到她。这样，我们公司这支造反力量就不致被摧垮。

支队委员们都赞同我的提议。但钟队长摇头。他说：“今后难保‘东方红总部’不受牵连，这些社会上的大组织，对总部的头头的情况，我们都不太清楚，万一他们出了问题，又会牵连到我们，我看，我们一个也不参加，马上声明退出‘湘江风雷’，我们这千把人的造反队伍，就在本单位独自搞一个组织，反正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精神造反就是，这样，谁出问题都牵连不上我们”。钟有新队长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至少，目前是可行的，大家都赞同他的方案。老易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我去把办公室外那块‘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取下来再说”。说罢，他就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一队红帽徽红领章草绿军装的士兵，突然威武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象从天而降似的，挡住了老易。我们都惊呆了，火烫了屁股似的从座位上忽地站了起来，不知所措。士兵们冲了进来，刺刀尖和枪口对准了我们，并连声高喊：“一个也不准动！”“谁敢动，就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当然不敢动。一个军装有上下四个口袋的青年军人走了进来。他腰间别的是手枪，显然，他是一个指挥官。他威严地怒目横扫了我们几个一眼，大声问：“你们是不是‘湘江风雷’的？！”

“是‘湘江风雷’下面的一个支队。”钟有新队长答。

“‘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你们知道吗？！”那个军官又厉声问。

“已经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钟有新说。

“知道了就好！”青年军官满意地手一挥，并朝周围的士兵命令：“先押到外面去！”

我们一共五个人，被押到办公室外面站着，三个表情严肃的士兵仍用他们手中的枪口和刺刀尖，对着我们。

在被押出办公室的一瞬，走在最先的老易和我，看到了二个熟悉的人，他们是我们公司原‘赤卫队’的负责人。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这儿，不料我们很快被押出办公室，看到了他们，一见我们出来了，他们稍有些面显尴尬，连忙“蹬蹬蹬”急促下楼走了。显然，士兵是这二人领来的。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搜查的士兵，在青年军官的带领下都从办公室出来了，“湘江风雷”的旗帜，袖章，印章，名册宣传资料以及那块还未来得及取下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

都是他们的战果。二个士兵还将扩音机、喇叭都抬了出来，我对他们低声说了一句：“扩音机、喇叭是借了我们公司的，不是‘湘江风雷’发的。”青年军官扫了我一眼，便扭头对那二个士兵说：“不是属于‘湘江风雷’的东西，就不要拿！”二个士兵又顺从地将扩音机喇叭抬回办公室。

青年军官命令我们五个人站成一排，逐一审问我们。

“你是什么职务？”他问老易。

“支队委。”老易答。

“你呢？”青年军官又问我。

“副支队长。”我连忙答道，心脏则“扑扑扑”猛跳起来。

他上下细细打量了我几下，没有吭声，又走过去问钟有新：“你！？！”

“支队长。”钟有新沉着地说。

钟有新的话刚落音，青年军官扭头手一挥，同时厉声命令：“把他捆起来！”二个士兵闪电般冲过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一下子就将钟有新紧紧地捆住了，推到另一边。钟有新并不反抗，因为深知反抗也无益。青年军官在问过了小李和支队联络委员小罗后，又转脸朝我们四个人扫了一眼，并问：“你们中谁姓易？”

“我姓易。”老易连忙答。

“是不是负责组织工作的？”

“是。”

“把他也捆起来！”青年军官又指示身旁的士兵。

“请你们告诉我堂客一下，要她莫急……”老易连忙对我们喊。

“叫什么！不准讲话！”一个士兵用枪托朝老易腰上就是一下，并吼道。在士兵们捆绑老易之时，我更觉紧张，同时也有些羞耻的感觉，因而竟然向那青年军官说：“我是副支队长，请问，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们去？”

青年军官望着我，好半天没有吭声，只管上下打量我。

“你多大了？”他终于问，但口气明显温和。

“十七岁。”我诚惶诚恐地答。

“算了！你可以不去！”青年军官微微抿嘴一笑，用手朝我一掸说。

在将钟有新和老易押走时，那青年军官对我们剩下的三个人说“你们的支队要马上解散，再不能参加‘湘江风雷’的活动了！否则，你们会倒霉的，听到了吗？！”“听到了！”我们连忙答道。

看到钟队长和老易被士兵们押走，小李长长的嘘了一口气，我则既觉一身轻松，但又时而心情沉重“老易只不过队委，我却是副队长，结果，没抓我倒抓了他，人家会怎么看我呀？议到老易被抓的事，我们都认为肯定是公司里有人告了密。“不然，为什么那个解放军单单问我们谁姓易？”小罗分析说，“肯定是那二个带路的家伙点的‘水’！”我想，大概老易因为是老工人，在我们“红色支队”负责人中年龄最大，无疑，公司里对立的保守派人员会认为老易是真正左右我们支队的主要人物，因而把矛头刺向了他，而实际上，老易在支队委中，却基本都是听从钟有新和我的。将老易抓去，实在是冤屈了他。

我们的“红色支队”顷刻垮了。支队部被公司机关造反派“东方红战斗队”接管，“夺权委员会”也张贴了拥护中央文革打倒‘湘江风雷’的标语，同时，宣布将钟有新和我“开除”出“夺权委员会”。我的同事阳金河、侯川江也被他们机修厂“夺权委员会”开除。他们俩也险些被抓。告密者带来一队解放军士兵，面指阳、侯是“湘江风雷反动头目”，士兵们绳索都准备好了，幸亏为首的军官问清了阳金河，他们机修厂的“湘江风雷”组织不过是支队下面的一个小



分队，而军官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支队长及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头头。”因此便使阳、侯幸免。

二月五日那一天亲历的事件，使我对军队介入政治的能量与态势，有了一个深深的认识与体会。所以，从那以后，每每从报纸或电视中看到某某国家发生军事政变的新闻，看到电视画面上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占领了城市的各制高点、或在大街上戒严的情形，我便能从对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那天发生的事件之记忆中，找到对这类新闻的深刻感觉。

由于“湘江风雷”的垮台，“高司”猛烈的舆论进攻，原属于“湘江风雷”这一派的各造反组织元气大伤。相反，各工矿企业商店机关的原“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一派的保守组织则纷纷复燃，不过，他们也变换了组织方式。一则是不用“红色政权保卫军”那已被判死刑的名称，二则吸取“红色政权保卫军”和“湘江风雷”均吃了被中央点名的亏，保守派的人员便不再组织大的跨行业、跨单位的社会性组织，而是以各自单位为基地，组成一个个不同名称但互相保持紧密联系的组织，向造反派发动了反攻。

“高司”开始是不愿同这些保守组织打交道，因为毕竟它认为自己是造反派红卫兵。而这些今天热烈拥护她支持她的人，却都是曾被它参与斗争并打垮了的对象。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势力毕竟单薄的“高司”，不得不在大力发展，建立它的农村支持力量外，同时也小心翼翼地接纳工厂里的前保守组织作为自己的盟友。

当斗争进一步白热化，最初的“造”与“保”的痕迹在社会组织的斗争中，表面似乎越来越淡。因为，到后来，已没有哪一个组织会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保守派”，也没有哪一个组织的名称不冠上“造反”二字。因而最终，大量的原保守组织的势力，便很快站到了“高司”一边。因为，在工厂商店、机关里、在工人中，尽管组织的旗号已发生变化，但互相比量的基本力量却没有根本变化：一方是“九·二四报告”的受害者为代表的一般工人，另一方则是九月抓“反革命”、打“右派”的积极分子们为代表的党、团员和党组织认可的政治骨干人员。

我们公司的原“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人员，很快成系统的建立了一个名为“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他们对外拥护省军区，支持“高司”，对内则宣称：“反动组织湘江风雷”以外的造反组织亦均为“造反动机不纯”的组织，“夺权委员会”必须解散等等。

公司党委成员们与这个“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有天然的联系，他们或明或暗却是真正支持它的。在此情况下，加上毛主席党中央来了最新指示指示，说凡夺权的地方，必须组成有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三方面人员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使中央一月号召的只由造反派夺权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因此，公司“夺权委员会”，便象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夺权机构一样，面临这种不利形势，不得不宣布自行解散，而以“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活动。

尽管原保守组织所组织的新队伍，冠上了时髦的“造反”徽记名称，但，我们造反组织，仍称其为“保守派”，这使他们很恼火。因此，在他们使用的各类宣传品中，便愈加高频率地使用“我们造反”的字眼和名词，希望人们抹去过去历史的痕迹。然而，当真正的造反派在后来倒了大霉时，这些保守组织的人员便将“造反”这个词抛入了粪缸，而很得意洋洋地诉说：“我们保守派”当年如何如何坚定“保皇”“保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斗争，历时长达十载春秋，尽管队伍的旗号，组织的攻击目标经常发生变化，但，其中互相对立和较量的势力，大致上没有根本变化。国内外有些作品和文章之所以将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校长老师，抄高级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的家；采用专案组方式迫害文化人或老干部等等文化大革命中一切整人的佩红袖章的打手，都归罪于造反派，都视其为造反派所为，就是因为那些作品的作者，实在是不清楚文革中两派斗争的历史过程所致。他们弄不清佩着红袖章，甚至佩着“造反”字号红袖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造反派。有些坏事是造反派干的，而更多的则是佩着红袖章的保

守派所为。

“湘江风雷”垮了，我这样有着“湘江风雷头目”身份的人，是不好去参加别的造反组织的。为了不致被人抓口实，别的造反组织必将谢绝我的投奔，我也不好意思，于是，我决定回机修厂去上班，当我的钳工去。

### （三）最初的结局

文革中，被打成为“反动组织”的群众造反组织，并非“湘江风雷”一个，每个省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如青海的“八一八”、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江西的“大联筹”等。但是，那些组织一般都是在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期，由各省的省军区自作主张将他们打成反动组织的。而由中央文革直接点名为“反动组织”的却不多见，尤其是由中央批示将一个省的主要大造反组织打成“反动组织”的事，大概也就这个“湘江风雷”事件。

虽然，后来在1967年八月十日，中央对湖南文革问题的决定中，批评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并撤消了它，在中共中央文件即“八·十决定”中承认：“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

甚至，毛泽东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段话，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做事的轻率：“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

但是，文革造反的浪潮中，作为曾经热烈号召、极力主张、坚决支持，拼命策动广大群众“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当初，为何却突然下达一条旨在摧毁“湘江风雷”这个明牌造反组织的批示？为什么在文革尚处在白热阶段之时，却这么轻易地对一个省的最大的造反组织开刀，还竟指示动用军队抓人，而之中，又还有些什么内情？此事，一直令湖南省的造反派们迷惑不解。至今，我也仍然不明白个中的真正具体原因。

也许，是因为“湘江风雷”已拥有了上百万成员且还在继续膨胀发展，而导致中央对其产生了顾忌？或者，再加上据省军区报告称这么大一个群众组织竟然还拥有了武器，（实际并没有，而是将省展览馆的革命历史展品枪支，作为“湘江风雷”的罪证拍照上报的，理由是当时省展览馆已经为“湘江风雷”的一个支队管辖）而使中央有了担心和愤怒？要么，是因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及其上级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都是林彪系统的战将，使中央文革视其为“自己人”而言听计从，便匆匆按军区的报告下了有利于省军区的批示？

但，这一切都只有猜测。真正的原因，也许要待将来的历史学家们才能探清楚了。不过，这种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下批示镇压一个造反派组织，而后又由党中央与中央文革宣布予以为其平反的事，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却似乎只发生有湖南省的这个唯一的案例。

而那个什么“一·二〇”就更离奇了。始终对这个“一·二〇”心存疑惑的湖南造反派，后来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过程中，多次向中央领导人反映这个指示的事。然而，周恩来总理在1967年八月十五日接见湖南造反派时，却说了“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周总理说：“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我们委托黎原同志（在湖南支左

的47军军长)，请回湖南继续调查。”最后，却始终没有查出或公布过此“指示”的来龙去脉真实情况，因而，“一·二〇”指示便成了一桩历史悬案。

□ 写于2005年二月五日

~~~~~

## 【文艺评论】

### 评喻智官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

• 傅正明 •

六十年前以奥斯维辛为象征的反犹太屠杀，今天仍然是许多西方文学名著的源泉。可是，在习惯遗忘的麻木中国，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已被不少人宣布为过时的话题。就文学作品而言，也有人说，文革题材已经写烂了。是的，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芙蓉镇》、《绿化树》、《晚霞消失的时候》、《大墙下的红玉兰》、《血色黄昏》等涉及文革的“伤痕小说”，以及随后出现的描述红卫兵运动的小说，如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胡月伟的《疯狂的上海》等。然而，这类作品仅能折射文革浩劫之皮毛一斑。由于作者不敢突破毛泽东与文革关系的禁区，它们根本不可能深入文革内在的骨髓，更无法触及没穿衣服的皇帝及其专制政体的症结，甚至荒谬地给红卫兵运动廉价和矫情地披上理想主义外衣，赞美红卫兵对领袖毛泽东的忠诚，有美化文革之嫌。

就在文革题材尚未展开却被有些人认为已经写尽的时候，作者喻智官推出了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这部迟来的文革小说，以上海某公寓为背景展开故事，用生动的情节叙述小人物的命运，以滴水折射全中国文革狂澜的开阔视野，艺术地再现了文革的历史真实，把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 ◇ 公寓“楼上”和“楼下”的对垒

小说以主人公吴国福的第一人称，娓娓讲述文革时发生在“福民公寓”周遭的故事。为了全景式展现上海普通市民在文革中的生死沉浮，作者写了近四十个有名有姓的主要人物，并把他们大部分集中在这座公寓中，以便于扣人心弦地表现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小说艺术匠心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利用福民公寓这座解放前属于法租界高级公寓的建筑特色，即楼上的豪宅和汽车间改成的底层普通民宅的对比，自然地摆开了文革中“楼上”“楼下”激烈的争斗战场，可是，到头来，无论是“楼上”的有产阶级还是“楼下”的底层居民，都难免受到现代皇权的人权迫害。

在楼上居民中，有大资本家白灵光和南荃裕；有曾留学日本的研究所图书馆员严易真；有解放前以卖笑为生的舞女；有留学英国的天主教徒楼思礼医生……，因此，用北京来上海点火的红卫兵的话来说，“福民里委住着不少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是资产阶级集中的老巢”。但是，革命队伍无孔不入，除了楼下的工人南老爷和姚大桶，区委普通办事员吴东旭等人物之外，早在解放初期，军队干部方长舟就在转业后搬进公寓，享受着住在楼上的特权，长期担任区委领导。他的妻子、人称古大姐的古月琴，担任福民里委党支部和主任。他们俨然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表。

以解放为界，《福民公寓》楼上楼下的贫富差距，和两者政治地位的倒置，形成巨大的对峙张力。这种社会冲突的暗流，借文革的政治浪潮决堤而出，在文革初期刮起抄家批斗的红色台风。当里委主任古月琴组织专政队时，楼下的吴国庆等人积极参加，向楼上名存实亡的资产阶

级挥宣战。福民公寓这个戏台，不仅揭示了大上海惨不忍睹的悲剧，也是全中国文革真相的缩影。

#### ◇ 记述文革牺牲品的受难

为了再现文革的历史真实，《福民公寓》以近乎记实的笔墨和大量细节，原汁原味地还原文革现场，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体味那段难忘的炼狱岁月。

小说从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开始，一幕幕地展示文革中一切反人类文明的行径：摧毁教堂庙宇，焚烧圣经佛经、古籍和外文书籍，查禁电影戏剧，蹂躏一代明星……。

在福民公寓里，“反动资本家”南荃裕被抄家游斗；右派分子南守坤被逼跳楼自杀未遂；在农村疗养精神病的南荃裕大媳妇，在乡下不堪游斗服农药身亡；日本“汉奸”

严易真承受不了儿子划清界限的反叛死在批斗台上；天主教徒楼思礼因在家做圣诞弥撒被押上批斗台；严轲因“收听敌台”被判七年徒刑；严母为此上吊自缢；舞女向户籍警卖弄色相自保，被判定腐蚀公安干部挨斗；里委专政队长古月琴起先领导抄家批斗地富反坏资本家，不料一年后，因丈夫方长舟被划入刘少奇线上的人而双双被押上审判台；主持批斗古月琴的治保主任冯大姐，文革后遭到古月琴的反攻倒算，最后也没逃脱被清算的命运；连文革初期的造反先锋上海红卫兵领袖吴国平，在文革结束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因反中央文革而被隔离审查。

斗人者最后自己被斗，一个都没逃脱。

#### ◇ 揭示文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但是，《福民公寓》并非罗列事件的记实作品，作者同时以虚构来推进情节的发展，深刻揭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内涵，描绘各式人物的复杂心理，刻画人物丰满的性格。

在批斗资本家南荃裕、右派分子南守坤时，专政队长古大姐利用南守坤的妻子乔玉珊和公公南荃裕的家庭纠纷，故意让她上台揭发。“她（乔玉珊）知道古大姐的歹毒用心，她撕下面皮批南荃裕，批到底，自己也一钱不值；不批，就和反动资本家沆瀣一气，等于飞蛾扑火。为了不殃及（女儿）延清，她沿着古大姐催逼的目光一步一步走上台。”这种心理描写充分揭示了人物在一个大悲剧时代的两难之境，及其遭受的比皮肉之苦更惨烈的心灵煎熬。在另一个批斗会上，严轲为争取成为毛主席的一名红卫兵，决定当众宣布和严易真脱离父子关系。当“大义灭亲”的严轲站到被捆绑的父亲严易真面前时，尽管感到一阵栗然，却不得不在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威逼的目光下进行揭发：“……他虽然是我的生身父亲，但他给我的所谓生命，不过是一只臭皮囊，里面没有最基本的人格和尊严。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从小学起，我就受尽同学们的白眼和歧视，最后被大学拒之门外。……我当了社会青年后，他硬逼我学日语，妄图让我继承他的反动衣钵，做日本人的忠实走狗。……“这里与其说是揭发父亲，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控诉社会，因为出身”汉奸“，严轲从小受尽了人格的侮辱，可悲的是，他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的父亲，并把父亲逼上了死路。再回眸”引章“中严轲小时候在父亲面前撒娇的细节，可以见出，自从解放到文革，共产党如何一步步唆使中国人抹杀人伦亲情直至灭绝最基本的人性。

《福民公寓》同时注意挖掘乱哄哄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多层次地展示各种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纠葛，以此探讨文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比如，同样是造反，红卫兵吴国平和他的战友的出发点是批判学校的官僚主义；而副区长方长舟为弥补自己没紧跟毛主席的失算，便指挥妻子古大姐在里委组织专政队攻击地富反坏资本家，因为“他们是负孽鬼，斗得再凶也有功无

过”；吴国庆因为家里没钱供她上高中心生怨气，借文革之机加入专政队去斗有钱人；工人姚大桶不仅趁抄家批斗的混乱顺手牵羊偷东西，还领着红卫兵儿子去抢占资本家的房子，被专政队长古月琴制止后怀恨在心，当古月琴遭批斗时他上台揭发批判；治保主任冯大姐文革前在古月琴手下受气，在古月琴倒台之时以百倍的凶狠回报她；而吴家的表叔虽然只是小业主，因住在贫民区，所在的里委没有够格的资本家，专政队就把他提拔成“剥削分子”抄家批斗；最令人深思的是，楼医生因救过副区长方方舟儿子的命，文革时得到网开一面免于挨斗的关照；而外来红卫兵查抄退休教师华侨林基山时，里委专政队员吴国庆不仅不配合，还出面挡驾保护了林公公，因为林公公过去一直喜欢吴家兄妹。

如此花样百出的造反众生相，是已有和将有的文革理论难以分类和归纳的，《福民公寓》就此留下了一幅立体生动的文革画卷。

#### ◇ 寻找导致文革的历史渊源

毛泽东的那句狂言“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触及产生文革的深层根由。文革前夜，楼医生与南守坤谈话时，引用了顾炎武“弥天成夏网，画地类秦坑”的诗句，暗喻如今号称的社会主义，其实是现代皇权时代，南守坤进而挑明，今天的文字狱更甚于封建时代。小说意味深长地写到熟读《大明英烈传》的南老爷给后生讲历史故事，说到红巾军起义，朱元璋暗害小明王的情节时，引起了听故事的后生“当时也有红军”的疑问，或“毛主席也打倒过一个王明”的联想。这里告示人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搞所谓路线斗争排除异己，到最后为了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不过是朱元璋火烧庆功楼诛杀开国元勋的翻版。小说中偶尔出现的留声机播放的京剧《海瑞上疏》的段子：“都是为大明朝日渐腐朽”，揭示了专制与腐败的必然联系，暗示文革之火被点燃的社会基础。

小说写了一个从北京到上海来串联的红卫兵，他在串联期间奸污了资本家的孙女南延冷，为了逃避自己的罪孽，离开前他给南延冷留下一个假姓名“毛文革”和假住址：“天安门一号”，这个看似讽喻的描述，把毛泽东掀起文革强奸民意的罪孽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但是，小说并没有简单地把文革罪责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进一步反思，为什么毛泽东能够一呼百应。在福民公寓中，方方舟和古大姐、冯大姐、吴家和南家彼此都是邻居，之所以一夜间翻脸不认人地厮斗，有其历史的恩怨。作者这样构思《福民公寓》中的两个对立主角：一个是出身平民的吴国福，一个是出身资本家的南延清，文革中吴家参与批斗南家。但追溯到他们两家的祖先，则正好相反，吴家的祖先是大地主，不幸被一场遭人暗算的大火烧的败落下来，而南家的祖先原来是平农，靠计谋掠夺了一个豪富的财产而发家。文革期间，像吴家的子女那样凭“红五类”出身参加红卫兵和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去批斗南家那样的“黑八类”，奉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分论，都是封建时代抱蔓摘瓜株连九族的重演。

由此可见，互相恶斗的文革发生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种民族劣根性在剥夺人权的社会主义歪树上长出的毒瓜。

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资本家白灵光和南荃裕的工厂在1955年的公私合营中就被没收了，南荃裕的大儿子南守乾坤受不了这个刺激跳楼自杀，他的妻子随后发疯；工人南老爷的妻子在农村中的几亩地充公了，还差点被划进富农，在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她想来上海却不可自由迁徙了；南荃裕的小儿子南守坤被打成了右派；解放前为日本公司工作过的严易真禁若寒蝉地生活着；区委办事员吴东旭十几年没加过工资，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在倒退，由此积蓄了各种不满和矛盾。

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思考和分析来进行历史总结，深刻指出：四九年后共产党禁止其他党派活动，压制民众言路，中国如堵塞了源头的一潭死水。如今领袖翻江搅海，抑郁者呐喊了，受压者反抗了，混合着斯巴达克斯砸碎枷锁的狂愤和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的勇武。红卫兵领袖吴国平在大字报中分析文革原因时，同样认识到，“除了领袖个人的号召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特权阶级与广大人民矛盾的总爆发……”。

#### ◇ 表现被迫害者的不屈抗争

与一定程度上暴露黑暗的“伤痕文学”不同，《福民公寓》展示了被压迫者在呻吟中的不屈反抗。其中右派分子南守坤对共产制度的认识最深刻，反抗也最强烈。南守坤原本是个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解放前夕，他的父亲希望他带着资金去香港或美国避风头，也给家里留条后路，却被他断然拒绝。他天真地相信，共产党会按照自己信誓旦旦的承诺，带给人民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解放初，南守坤义务去父亲的工厂当夜校老师，还不惜离家艰难自立，也不遵守“不娶异姓”的祖传老例，和普通女工结婚。

但是，共产党强制推行公私合营逼死了哥哥，使南守坤开始了新的认识，他明言中国还不具备公私合营的基础，而且不应强迫实行。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并送往农村劳改，直到精神异常才被允许回上海。从此，他开始不停地写抗辩信为自己申诉，要不是家人把他写的信扣下，他早就给关起来了。

南守坤最后还是无法逃脱文革厄运。他虽然明白自己即使是一只铆钉，也会被强大的专政机器辗成齑粉，但他仍然做出应有的抵抗：面对前来抄家的人，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进行自卫；被游斗后他写反抗暴政的大字报，因此罪加一等遭逮捕时，面对上门的警察，他以死相抗，在一种“清醒的疯狂”中他仰天大笑：“是的，我疯了，在这个颠倒的疯狂世界里，我是疯子，你们都是正常人，这个世界不容我，我也不容于这个世界。我学那鲁仲连，宁蹈海也不事秦。如果你们逼我下人间地狱，我就选择上极乐天堂。”跳楼自杀未遂的南守坤活过了文革，毛泽东去世后，他在群众追悼会上幸灾乐祸地唱“送葬词”，激怒了专政队长冯大姐，不料冯大姐非但没能阻止他，反而被他从四层楼上扔下去……南守坤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他由支持共产党到觉醒最后英勇抗争的过程，写得入情入理。

南守坤的妻子乔玉珊也是一个不甘受辱的人，不过她仗着自己出身工人，面对各种摧残，反抗起来更加得理不让人。毛泽东逝世后，她拒绝佩戴悼念的黑纱，并公开宣称：“家里被抄得精光，找不出一块像样的黑布，每月领的生活费不够吃用，哪有余钱买黑纱！”当她的右派丈夫得到平反时，她不仅没有“感激涕淋”地谢恩，还利用里委最后一次批判大会的机会，哭诉了自己一家二十多年的冤屈，向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讨。

上海这座曾经受过西方殖民者统治的大城市，深受基督教精神的浸染。尽管各种教会和教堂在解放后惨遭破坏，但许多教徒的信仰不仅没有被完全摧毁，基督教的教义还成了他们反抗强权的强大精神武器。楼医生和他的一些教会朋友在民众为毛泽东祝寿跳忠字舞之际，仍然坚持在家举行每年一次的圣诞弥撒聚会，这种地下教会活动当然是“犯罪”行为。楼医生因此被押上批斗台，当工人柳大宝对准他狠狠抽了一记耳光时，他遵循耶稣的教导，泰然地请柳大宝打他的另一面脸。柳大宝在批斗会上打过许多“坏人”，却从来没有碰到过讨打的人，他不禁有点敬畏那个天主，因为崇拜他的信徒，竟然和毛主席培育的战士一样坚强。

这种无声的反抗，比有声的呐喊更有力。从文化意义上来看，作者有意识地通过类似的情节和人物从各个角度来审视文革。耶教的信徒们深感魔鬼主宰世界，他们不得不接受天主的考验，等候“末日审判”。作者借南守坤疯疯癫癫哼唱的“好了歌”，从佛教四大皆空的角度针砭

了国人的“无明”。

#### ◇ 《福民公寓》的艺术特色

《福民公寓》的文学成就，除了刻画人物性格，精心组织情节谋篇布局之外，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反讽（i r o n y）艺术中。“反讽”这一极为丰富的西方美学概念，要言之，就是在微观与宏观、前因与后果、形式与内容、现象与实质等两极之间形成一种对比的审美惊奇。作者以福民公寓的几个家庭的命运为线索，编织文革时期以及这场浩劫前后多方面的社会矛盾。

福民公寓虽小，它的故事却有其国际共运的大悲剧背景。小说在进入文革启幕的第一章之前加了一个引章，描述两个住在福民公寓（当时叫福克公寓）的流亡白俄（上海人称他们为罗宋人）在上海解放前夕引发的骚乱。

白俄亚可夫斯基，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宫廷乐师，十月革命后为逃避迫害流亡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他听到解放军过了长江，就知道中国很快会落入红色恐怖中，苏维埃悲剧将在中国重演，遂决定移居加拿大。另一个白俄诗人兼画家伊凡，他在十月革命后因持不同政见，和一百多名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列宁驱逐出境，面对即将解放的上海，他不愿吃共产党的二茬苦，和妻子选择了自杀。

白俄的逃离和自杀虽然引起公寓里居民的恐慌，但大多数人还是以观望和期待的心情迎接共产党的解放。然而，一切都没有出乎白俄所料，共产党带给人民的所谓“解放”不过是灾难的代名词。任意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凌辱和杀戮的暴行，与斯大林的肃反镇反烂杀无辜一脉相承。小说通过许多人物情节的闪回式的蒙太奇，展示了从解放后到文革的十七年中公寓居民翻天覆地的变迁。这种变迁充满了历史的反讽或命运的反讽，一种情节发展与当事人的愿望适得其反的过程。当方长舟被勒令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这个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把无数人送去“劳改”的革命干部，结果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劳改”的绳索。这类情节，都是典型的反讽，尽管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在小说中仍然需要作家以审美的眼光把它们提炼为典型情节。

到了小说结尾，福民公寓的居民经过文革的折腾，终于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理解了白俄当年的行为，有海外关系都纷纷告别中国，没有海外关系的也设法逃往西方自由世界。

“福民公寓”原来叫“福克公寓”，解放后方长舟搬进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新上海的公寓应该造福人民，岂容殖民者保留遗迹，他大笔一挥，写下：“福民公寓”。可是，公寓中许多人物遭遇的迫害，使得这一名称成为一种“修辞的反讽”，隐含着字面意义与潜在的真实意义的背离，革命形式与革命实质之间的背离，应当读作“殃民公寓”。解放后的历史，大体上都是祸国殃民的历史。

在批斗“走资派”方长舟时，工人姚大桶批判道“……解放初，方长舟搬进公寓，定规要把福克改成福民，象煞有介事，要造福人民，到头来，只富了你们一家。”工人柳大宝也说，“……我绰号叫柳大炮，难免为（十几年不加工资）这点事发牢骚，你们这些做官当老爷的，是高高在上面朝南坐的菩萨，说不得，碰不得，讲我对现实不满，给我穿小鞋，找借口克扣我几块钱的奖金。过去（解放前）闹罢工后，照样上班拿工资，工头和老板不敢拿我们怎么样，你们不是比资本家还凶狠？”

这不仅仅是他们对享受特权的方长舟个人的批斗，而是老百姓乘机吐露自己的心声：解放后老百姓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全面倒退，而建国后兴起文革达到高潮的不断改换新名称，正好和

社会发展的现实相反，最后都成为谎言，成为一种讽刺。

在《野蛮的诗歌》(The Poetry of Barbarism)一文中，美学家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谈到诗人惠特曼时指出，“他充分地感到一种个性特征和他所描绘的对象的普遍性——它本身是一滴水，却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深刻的作品和肤浅的作品的差异往往在于，前者以一滴水见大海，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后者一滴水就是一滴水，游离在大海之外，只能反映出某种似乎孤立绝缘的生活面，因此容易干枯在沙地上。《福民公寓》的滴水，是不易干枯的。文革狂澜过后，打捞历史的沉船，打扫海滩的废墟，清点水面的浮尸，为死难者竖立纪念的墓碑，并且重新扬起千疮百孔的风帆，继续中华民族的历史航程，仍然是中国作家的道义责任。

□ 原载《民主中国》网站

~~~~~  
【当事者说】

### 从12军军管安徽的经历看文革大动乱

• 李德生 •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〇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



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

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反夺权派”则说“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对解决安徽问题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对12军的满腔希望，使我深深感到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当时的气氛与战争年代到上级受领紧急作战任务，相差无几。我也来不及考虑更多，只是想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同时，我也向周总理请示：12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部队都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总理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受领任务的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不知道要艰巨多少倍，这对12军的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当时所知，前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为数不少。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总理的指示中，使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 把问题倒过来解决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途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音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便于在沿途能够亲自看到真实情况，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们找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12军（当时代号为6408部队）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就给你来一次考验，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也取了分区和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们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

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我们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等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关系，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 and 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武斗，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对12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表示满意。他并且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制止武斗，稳定局势。后来我们在抓“三支两军”工作中，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及时向周总理报告，并都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汽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不听，我们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我们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汽车挡了回去。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我驻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为进一步做群众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这就为解决安徽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我们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到了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群众组织手中掌握着武器，是一大隐患，有了武器随时都可能爆发流血武斗，会使形势恶化，别的一切就都谈不上了。合肥两派，经我们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 ◇ 靠大造舆论取胜

省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全省各地形势发展仍不平衡，由于内部的原因和受外界的影响，少数地、市、县，几经反复，各方仍未达成协议，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个别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重。“九·五”命令公布以后，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部分，有的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极不稳定。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初期，芜湖的群众组织，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仍未解决问题。因此，芜湖的派性全国有名。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年5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怀着不满情绪，活动频繁。我在安徽搞“三支两军”工作近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遇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冷静处理。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看起来是很吓唬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在工作中的自信心也就不断增强了。因此，我接到芜湖的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

为了摸准情况，我决定亲自到芜湖去，而芜湖两派都要求我去解决问题。当时，芜湖已完全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特另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是谁也难以预料的。省里和军里许多同志都不太主张我去。大家关心我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芜湖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于是我向省里、军里的同志作了说服工作，带着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一路上，和我同车的秘书谈起工作方案，我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根据调查了解那里实际情况后才能定，才能先有框子。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我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到了35师师部，听了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别去各派做工作；我和35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

~~~~~  
【各抒己见】

毛泽东为什么不准周恩来做手术？

• 洗 岩 •

我没有拜读高文谦先生《晚年周恩来》一书原着，只读了他与司马公的争论。仅从争论双方所引用的论据和所作推理看，也不难看出双方的高低真伪之别。高先生无论在资料的扎实还是解释的合乎情理方面，都明显高于对手。

关于论据资料，笔者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对于史实的解读，有一些与高先生不同的看法，现择要说两点。

一，高文中最惊人的猛料，无疑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疾病治疗的“四条指示”，其实质就是“不准治疗”，最后导致了周匆匆辞世。高文将毛整治周的动机用心解释为“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林彪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这既源于毛泽东对周恩来批（极左）而产生的不满，也因为毛泽东对西方舆论渲染（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没有说到点子上；上述考虑或许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对周恩来施以诸多压迫的部份原因，但并非其中关键。

毛泽东是个政治人物，其所作所为主要服从政治需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所急须面对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重新选择“接班人”。如果说毛从周的历史表现中早已了解到周不可能是自己“革命路线”的忠实继承者的话，那么“林彪事件”后所翻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给毛敲了警钟，使他更加看清了党内许多人对“文革”的真实态度。接班人难找，周批“极左”更佐证了毛对周的猜忌：周不但不会是毛“革命路线”的合适接班人，而且将对真正的接班人继承毛泽东“革命路线”构成极大威胁。以周的威望之高、资历之厚，毛后将无人能制。因此，周成了毛泽东顺利实现权力交接、保证“革命路线”代代相传的最大障碍。正是这种形势变幻，使周阴差阳错地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最大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毛的决心既下，即使以周的善于自保，也不可避免要陷入困境。但是，党内游戏毕竟还是有规可寻，周也毕竟是这种游戏和自我保护的大师；毛本人也有着多重目标需要兼顾，尤其在“林彪事件”后，毛已不复再有当年倒刘之勇，已不可能再“不顾一切”地打倒周；在游戏规则内，毛虽然能给予周诸多折辱，但最后竟然还是无法仅凭政治手段就彻底打倒周，于是只能借助于生理手段，这就是“四条指示”的来历。

由于缺乏公共参与机制，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政治，具有宫廷政治的某些特征。在传统政治中，君主为保证权力交接和政治稳定，临去世前千方百计除去对新君即位可能造成威胁的重臣，这种故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就象慈禧必欲光绪先已离世一样，毛的作为，也只不过是循历史故迹而已，既不足为奇，从传统政治的逻辑衡量，也不足为耻。后来的邓小平，是通过自己提前隐退的“现代禅让制”解决了这一难题，其意义可与清王朝发明“密建储君制”一举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传统政治的框架内，现行政治制度也存在可以作出改进的弹性和空间。

二，高文的第二大猛料是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落井下石”。其实，在当时环境下，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如高文引用邓榕书中所述：“发言一开始，他（邓）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背景下司空见惯。邓“一步之遥”的说法虽然严厉，但其实也只是在敲警钟，并非坐实某项罪名。邓的做法虽然“不光彩”，但也并非什么

大不了的“老底”，这只是政治人物在政治环境下的必然反应，否则他就不是或者不可能在当时成为政治人物。对此，周也能够理解和体谅，邓的“违心”批评并不比他自己在文革初期对“刘邓”的“违心”批评更过份出格。因此，这种相互批评的游戏并不影响其后周邓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更不足以构成可以否定“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周恩来传人”的证据。当然在事后，邓必然会希望掩盖此一“批周”经历，这就给高文“出料”创造了机会。但是，从史家角度而言，罔顾其后周邓在政治上的合作、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休戚相关，片面夸大这一在当时政治生态下的常例，这显然是不严肃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当然有制衡周的考虑。但政治是复杂的，仅此并不足以否定周恩来“在幕后推动邓复出”的作用。周也有周的考虑，周很清楚邓对“文革”的态度，让邓复出至少可以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自己在反“极左”问题上势单力薄、而且不善于正面对抗的困境；二是可用邓引开毛的注意力、分散压力，使自己能够重新回到自己最易应付自如的具有缓冲回旋余地的位置。除非周有自信即使是毛也无法撼动其政治地位，否则他绝不会不乐见与自己在主要政治见解上相接近的邓的复出。

虽然邓小平在复出前作了深刻检讨，但以毛泽东对人性了解之透彻，不可能不怀疑邓对文革的真实态度。毛用邓有其不得已，不大可能是瞩目让邓成为接班人。邓的复出更大可能本来就只是一种平衡和过渡的考虑，毛所中意的江、王、张诸人，当时并没有同时兼顾国内秩序恢复和制衡周两方面目标的能力。

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能超脱于历史条件和环境。因此，对政治人物言行、作为的评价不能简单依据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观或者知识分子的普世情怀，对传统政治生态下的人物评价也不能套用现代开放性竞争生态下的政治规范。将个人的作为和体制的作用区别开来，这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否则，历史研究永远只能服从于现实政治或商业需要，只能是“政治的婢女”，只能“任由权势者及其御用文人梳妆打扮”。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